

历史地理

创刊号

中国地理学
会历史地理
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
编委会编

历史地理

创刊号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顾廷龙
责任编辑 刘伯涵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历史地理

创刊号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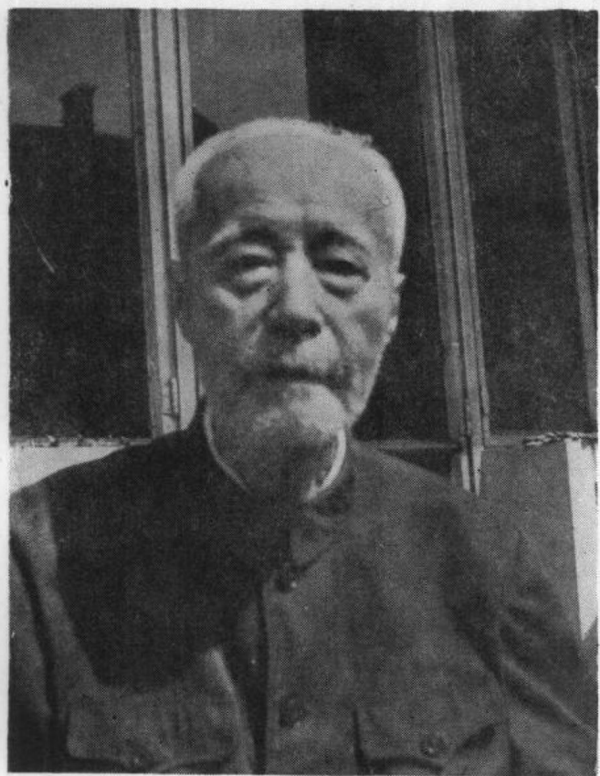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5 插页 1 字数 348,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书号 11074·475 定价(七) 1.50元



沉痛悼念 顾颉刚 先生逝世

本刊顾问顾颉刚先生因脑溢血抢救无效,于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解放前后历任北京、燕京、复旦等十几个大学的教授和前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等职。

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探索真理的精神,终生献身学术研究,对中国古代历史和历史地理、古籍整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影响深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国当代的历史地理研究,是在先生倡导下开展起来的。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在他的号召之下,集合了一批学人,以私人的力量创办了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编印《禹贡》丛书,在当时学术界造成了一股研究历史地理的风气,从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学会的活动,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学的专门研究工作者,为建立、发展这一学科扎下了基础。

为了继承和发展禹贡学会的事业,在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主持下创办了本刊。本刊在创办过程中,得到了先生的热心支持,亲自为创刊号撰写论文。我们正热切地期望先生今后对本刊的指导,不幸在本期即将出版之际,先生遽尔谢世,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失去了良师,曷胜痛悼!

噩耗传来时本期已排印就绪,只能插入此一页。从下期起,将陆续刊载纪念先生生平学行,特别是先生在历史地理学方面成就的文章。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 录

发 刊 词 ····· 侯仁之(1)

《禹贡》中的昆仑 ····· 顾颉刚(3)

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 ····· 黄盛璋(9)

⑨ 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 ····· 史念海(21)

⑩ 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 ····· 赵永复(34)

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 ····· 谭其骧(48)

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 ····· 陈桥驿(65)

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 ····· 邹逸麟(80)

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 ····· 张修桂(99)

百泉水利的历史研究

——兼论卫河的水源 ····· 钮仲勋(117)

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 ····· 王开发 张玉兰(126)

中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 ····· 文焕然 何业恒(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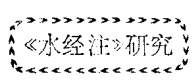
浙江省宋至清时期旱涝灾害的研究 ····· 夏越炯(140)

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 ····· 刘敦愿(148)

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 ····· 魏嵩山(160)

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 ····· 徐俊鸣 郭培忠(169)

~~~~~  
} 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札记 { 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 ····· 谭其骧( 179 )  
~~~~~



《水经·浊漳水注》一处错简

——兼论西汉魏郡郡会侯国地望 ····· 周振鹤 (182)



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 (187)

楼兰遗迹考察简报 ····· 侯 灿 (195)

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

——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 ····· 张天麟 (203)

“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 ····· 徐兆奎 (211)



回忆与希望 ····· 侯仁之 (220)

继承和发扬《禹贡》精神 ····· 郭敬辉 (221)

回忆《禹贡》 ····· 杨向奎 (223)

纪念禹贡学会 ····· 王树民 (225)

继承优良传统 继续奋发前进 ····· 唐晓峰 (226)

“扶桑”讨论综合评述 ····· 朱 方 (228)



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 ····· 王文楚 邹逸麟 (231)

评《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摘译) ····· 赛明思 (235)



分湖·风湖·汾湖 ····· 张舫澜 (33)

斯文赫定(Sven Hedin)对中国地理测绘史的一点正误 ····· 一 得 (79)

长芦晒法制盐始于何时 ····· 孔祥铸 (98)

六朝人之所谓“北京” ····· 葛剑雄 (186)

宋川峡二路分成四路 ····· 祝培坤 (227)

Contents

1. Foreword Hou Renzhi (1)
2. The Kunlun in "Yu Gong" [Gu Jiegang] (3)
3. Researches Concerning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Xi Tian Lu Jing", a Script
Found at Dun huang Huang Shengzhang (9)
4. The Loess Plateau and the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ts Agricultural,
Forestry and Pastoral Areas Shi Nianhai (21)
5.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Mao Wu Su Desert in History
. Chao Yongfu (34)
6. The Channel of the Yellow River in Its Lower Reaches Before the Western Han
. Tan Qixiang (48)
7. On the Shifts of the Channel of the Puyang River in Its Lower Reaches in
Historial Periods Chen Qiaoyi (65)
8.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Shangdong Canal
. Zou Yilin (80)
9.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the Evolution of Lake Tung-ting . . . Zhang Xiugui (99)
10.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Irrigation of Bai Quan Niu Zhongxun (117)
11. Some Inferences of the Climatic Changes in the Region of Shanghai-Hangzhou
During the More Than 10,000 Years Based on Spore and Pollen Analysis
. Wang Kaifa Zhang Yulan (126)
12.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the Peacocks in China
in Historical Periods Wen Huancan He Yeheng (132)
13. A Study of Drought and Waterlogg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Song to Qing Xia Yuejiong (140)
14. The Restoration and the Layout of the Capital of Qi Kingdom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Liu Danyuan (148)
15. The Rise of the City of Hangzho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Township
. Wei Songshan (160)
16. Handicrafts in Ancient Guangzhou and Its Periphery
. Xu Junming Guo Peizhong (169)
17. Notes on the Drawing and Editing of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The Shui Da Da Lu and Kai Yuan Lu in the Yuan Dynasty . . Tan Qixiang (179)
18. A study of "Shui Jing Zhu":

- “Notes to the Zhuo Zhang River” in “Shui Jing”:
 A Misarrangement of Paragraphs Zhou Zhenhe (182)
19. Investigation Reports
 A Brief 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to the
 East of Taihu Lake and the Eastern Taihu Area
 Research Division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g University (187)
 A Brief Report on the Study of the Ruins of Loulan Hou Can (195)
20. The Contribution of Zhang Xiangw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in
 China Zhang Tianlin (203)
21. The Research works of “Yu Gong” Societ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Xu Zhaokui (211)
22. In Memory of “Yu Gong” Society:
 Recollection and Expectation Hou Renzhi (220)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Spirit of “Yu Gong” Society Guo Jinghui (221)
 A Memory of “Yu Gong” Society Yang Xiangkui (223)
 In Commemoration of “Yu Gong” Society Wang Shumin (225)
 Inherit the Fine Tradition and Press on Boldly Tang Xiaofeng (226)
23. A Summing-up Commentary on the Discussions of Fu Sang Zhu Fang (228)
24. Book Review:
 “District Hist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Yuan He”:
 The Earliest General Gazetteer of China
 Preserved Down to This Day Wang Wenchu Zou Yilin (231)
 O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 S. Samuel (235)

发 刊 词

侯 仁 之

《历史地理》的编辑和出版,标志着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历史地理作为一项专门的研究,在我国是有自己的传统和明显的特点的。这和我国版图辽阔与历史悠久密切相关,特别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疆域范围时有消长,行政区划每多变迁,加以城镇的兴衰、地名的更替、道路的通塞、河流水系的迁移等等,真正是错综复杂,头绪万千。如果不把这些变化,详加说明,不仅在行政管理上有很多困难,就是在阅读史书上也不免有扑朔迷离之感。因此,在我国首先是在史学研究的领域里,出现了有关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其主要目的是通达古今之变,是为政事、也是为历史的研究服务的。其中比较晚出而有代表性的系统著作,当首推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其次,从“方舆”的研究来说,地图又是最重要的工具。作为研究历代疆域变革的专著,不是以文字而是以地图表现出来的,又以清末民初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最称巨擘。景范家学渊源,忧国为先;惺吾师承有道,集腋成裘。他们都发扬了我国学者的优良传统。辛亥鼎革之后一直到祖国解放之前,国家民族日益深陷危难之中,但是大多数爱国的知识分子,仍企图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尽其所能,力图挽救祖国于危亡。尽管在那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不过忧国忧民之心,不能不促使他们去探索“学以致用”的道路。而以研究祖国历代疆域变迁为己任的人们,面对着强邻压境、神州板荡的局面,更是坐不安席。当时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主讲“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顾颉刚教授,决心和当时在辅仁大学主讲“中国地理沿革史”的谭其骧先生,共同联合三校师生,发起组织“禹贡学会”,谋求通过本专业的研究工作,更深刻地认识祖国的现状,继而探索前进的道路。但是“禹贡学会”的存在,只不过短短三年半时间,就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北平的时候,被迫终止活动,颉刚先生险遭逮捕,幸免于难。但是“禹贡学会”在这短短三年半里所做的工作,却是有很大影响的。首先是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从而组合了社会上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吸引了学校里一大批志愿献身于史地研究的青年,标榜古为今用,一时蔚为学风,因此而引起强邻的侧目,被评为“禹贡学派的人们”。在“禹贡学会”多方面的学术活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开展对于边疆地理的研究,和绘制“地图底本”、作为编纂全国历史地图的准备。这两项工作,也都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但是真正的种子播下去,一旦时机到来,总是会萌芽、成长以至开花结实的。

新中国的诞生,终于为祖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解放前“禹贡学会”所播下的种子,又在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起来。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十年

动乱期间虽然遭受了严酷的摧残和破坏,但是顺应时代要求而成长的东西,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里表现得最突出的,是新中国在历史地图的编绘上所取得的超越前人的重大成就。实际上这项成就也是“禹贡学会”时代所难于设想的。事物总是在发展中,新生的东西总是在不断地出现和成长。不仅是历史地图的编绘突破了“禹贡学会”时代所设想的旧框框,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也已经不仅以疆域沿革为主,而是在新时代新任务的要求下,开拓出了无限广阔的新领域。《禹贡》半月刊原定的英文名称就是《历史地理》半月刊,可是解放以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了极大的新发展。植根在我国深厚的历史土壤里的历史地理学,正在作为一门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兴学科而茁壮成长起来。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在百花齐放的科学文化的大花园里,也为这门新兴学科开辟出一隅之地,使新生的萌芽得以迅速成长,使盛开的花朵益增芬芳。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册《历史地理》,就是我们的新园地,这里有“禹贡学会”时代披荆斩棘的老园丁,更需要的是头角峥嵘的新生力量。大家共同携起手来,在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上,奋勇前进吧!我们这门学科是大有可为的,我们殷切期待着从我们所耕耘的这一隅之地,也将培育出奇葩异卉,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在祖国科学文化的大花园里,绽放光彩。

一九八〇年二月八日

《禹贡》中的昆仑

顾 颉 刚

《禹贡》，是中国科学性的地理记载的第一部书，它把《山海经》净化了。这两部书相传都是禹做的，然而实际上却出现于两个时代。《山海经》文字的写定可以较迟，但它的传说和图画必是很早的。《左传·宣公三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依郭璞《尔雅注》引应作“禁御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这种对于自然界的伤害的恐怖就是《山海经》出现的背景。这时间固不必在夏，但总是够早的；其创作或传播者则为巫。至于《禹贡》，其时代必在战国越灭吴（那以淮水为北界的扬州即是越州，“扬”和“越”是双声，越占有淮水流域在灭吴后）和秦灭蜀（梁州入了中国的版图）之后，其创作者为地理学家。那时全中国已都开发，对于自然界的恐怖业已消除，而且水利工程十分发达，或引水溉田，或灌水作战，或沟通数川以利交通，他们有了正确的科学知识，想具体地把各处的山川、土壤、田赋、物产、交通都写出来。不过那时是“托古改制”的时代，什么事情总喜欢推在古人身上，要使古人作今人的指导，所以他们想起传说中的治水祖宗禹，名义上替他做成《禹贡》这篇书，实际上则是发表各专家们的学问。书里说禹怎样分画土地，又怎样治理山川，又怎样规定

人民的贡赋。除去禹的故事部分仍不免留些神话色彩（如“禹敷土”、“禹锡玄圭”）外，其余可以说十分之九是实际收集来的地理知识。还留着十分之一，因为道路远，交通不便，不得亲去，只得沿袭旧说，而旧说是实在靠不住的，所以他不自觉地留下了一些错误在这可宝贵的经典上了。

《禹贡》作者分天下为九州，西北方因为秦都于雍，称为雍州。这作者好象是雍州人（这一点和《山经》的作者相同）。所以那边的山川名和种族名记得比别的州多，这章的最后一句是：

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关于这一句，西汉以上的解释我们找不到了。我们所能见的最早的解释是东汉马融作的《尚书注》，他道：

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经典释文》卷三引）。

这是根据《汉书》及某一书（此书即为后来范曄作的《后汉书·西羌传》所采用）的，可是于渠搜无解释。郑玄的《尚书注》则说：

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昆仑，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尚书正义》卷六及《史记·夏本纪·索隐》引）。

他以为这是三个山名。但他为什么说“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因为到他的时代，昆

仑早已移到塞外很远的地方，不能包括在雍州里了(详后)。昆仑既不能在雍州而《禹贡》雍州明有昆仑，所以他说：雍州里的昆仑是西戎所居，此外还有一个昆仑则是河水所出。到三国，王肃作《注》，除沿袭马融注外，还说了一句：

西戎，西域也(《尚书正义》卷六引)。我们知道，汉以玉门阳关以西为“西域”，他这样说，是有意把雍州的西界推到葱岭去。换一句话说，因为昆仑山已移到西域，所以西戎也跟着移去，雍州也跟着放宽了。王肃自身，或同时的人，或稍后的人(这是一个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替西汉的孔安国作了一部《古文尚书孔氏传》，说：

织皮毛布。有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属皆就次叙，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郑玄释为“三山”，他却注为“四国”，为什么？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为他解释道：

言织皮毛布有此四国：昆仑也，析支也，渠搜也，四国皆是戎狄也。……或亦以“渠搜”为一，通“西戎”为四也。

织皮，是用皮毛织成的布，现在西藏的氍毹即是。这几个国家都以织皮为衣，见得和中原的文化不同。伪孔释的四国，《正义》解为有两个可能：一是把“渠搜”分为两国，一是把西戎加进去。究竟哪一说对？由我们看来，这都不可通。“西戎”是戎的通称，如何可为一国所独有，这是很明白的事。“渠搜”，见《大戴礼记·五帝德》，云：

帝舜……南抚交趾、大教，〔西〕鲜支、渠庚、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夷〕、鸟夷、羽民。

这是说舜德及于四方夷人，故以“抚”字总括下文。“鲜支、渠庚”，《史记·五帝本纪》引作“析支、渠庚”，“庚”“搜”同音通假。《逸周书·

王会》作“渠叟”，《穆天子传》作“巨蒐”，也并是同音通假。“渠搜”二字，古籍中凡有所见，总是连文，没有单称过“渠”或“搜”的，实在见不出该分为两国。所以伪孔《传》四国的说法是讲不通的。

再问马融为什么只释昆仑析支所在而不释渠搜？这有一个缘故在。汉的朔方郡里有一个渠搜县，朔方郡为今内蒙古河套地，渠搜县为今杭锦旗地，居于正北，如果依据《汉书》而说“渠搜在朔方”，分明与下文“西戎即叙”相妨，所以他不提。其实朔方为汉武所立郡，他是最提倡经学的，对于新立的郡县最高兴用古典名词，例如“朔方”即出于《诗经·小雅·出车》的“城彼朔方”。可是獯豸所侵的是方，《诗》中说“侵镐及方”，可见方与镐极近。镐是镐京，方在镐京的北面，所以称为朔方。这朔方之地原离周都不远，必不在此河套；给武帝这样一用，就使后人陷于迷惘中了。“渠搜”一名也不过他从《尚书》里钞去而已，那地并没有实际的渠搜国存在。渠搜何在？苦无实证。拿《穆天子传》看，穆王东还，先到巨蒐，又走三十七天方到河套里的酆国，这见得巨蒐远在河套的西南，好象在祁连山之南。如果这样，那么这国还是近于析支、昆仑。

昆仑、析支、渠搜是三个西戎的国家，因为在雍州塞外，所以《禹贡》作者记在《雍州章》里，他丝毫没有把昆仑涂上神秘的色彩。

在《禹贡》里还有几个地名是和本文有关系的。第一是“积石”，书上说：

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雍州章》)。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入于海(《导水章》)。

上一句说的是入贡的路线，从最西头的积石起，经过河套，到今陕西韩城县的龙门(这相

传是禹所凿开的),再会合在渭水的北面。因为在传说里,尧都平阳,舜都蒲坂,都在山西的西南角上,所以雍州的贡品只要顺着黄河走就可运到帝都。下一句是说禹的治水,从源竟委,所以治黄河得由积石起,于是依次施工,到龙门,到华阴,……直到入了海而止。河出昆仑,自《山海经》以来本是确定的了,何以在这一篇里,禹不导河于昆仑而但从积石导起?从《西山经》看,河是由昆仑到积石的,《经》云:“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见得积石是河水所经的山。《汉书·地理志》:

金城郡河关县:积石山在西南羌中。

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

河水是东北经积石山而入河关县境内的,和《西山经》所说的“西流”方向恰恰相反,这当然是《山经》的误文。《禹贡》作者何以不说“导河昆仑”,竟放弃了这源头?想来必是他嫌昆仑富于神秘性,所以但把这名列在西戎,其它就跳开不谈了。

第二是弱水,书上说:

弱水既西(《雍州章》)。

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水章》)。

按《汉书·地理志》:

张掖郡删丹县: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又居延县: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

可见这是河西的一条水,起删丹至酒泉而入居延的。居延海在沙漠中,所以也有流沙之名。郑玄依据了这说,也注道:

众水皆东,此独西流,故记其西下也(《尚书正义》卷六及《史记·夏本纪·集解》引)。

《地理志》:弱水出张掖。凡言“导

者,发源于上,未成流。……合黎,山名。《地说》云:“合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泽。《地记》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余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尚书正义》卷六及《史记·夏本纪·集解·索隐》引)。

这也是《山海经》里昆仑下的一条水,而《禹贡》作者据了现实性的水道来作解释,经桑钦考定为现今的额济纳河。可是这条河除临泽高台间一小段西流外,大部分是北流的,是不是它的被定为弱水是出于桑钦一人的意见呢?

第三是黑水,书上说:

华阳黑水惟梁州(《梁州章》)。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章》)。

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水章》)。

这几句话真难死了人!黑水可以做雍、梁二州的西界,又是入于南海的,一定是一条西方极大的川流,纵贯西北和西南的,但这究竟是现在的哪一川呢?三危,《河图》以为在鸟鼠西,杜林以为在敦煌(均见后),这两说虽差得颇远,总可因三危而定黑水为发源甘肃西部直南到暹罗湾入海的。但是这样一条大川,固然地图上找不到,也更为实际的地形所不许可。可是以前没有作过地形的实测,许多学者想不到这一点,于是他们的解释就纷歧了。第一派是敷衍经文,如伪孔《传》说:

黑水自北而南,经三危,过梁州,入南海。

这样解释太敷衍了,见得毫无办法,所以孔颖达《正义》就替它矫正道:

《传》之此言,顺《经》文耳。案郦元《水经》:“黑水出张掖鸡山,南流至燉煌,过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张掖、燉煌并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

自积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水经注》颇有散逸，此文为今本所无。拿了此文比较伪孔《传》，不过多出了“张掖鸡山”数字。孔《疏》钞进了还觉得不妥，因为黄河自西而东，黑水自北而南，必然相会，为什么《禹贡》里竟没有“会于河”的记载？他又解释道：因为积石以西河多伏流，所以黑水南流可以不牵涉黄河。关于这一点，赵一清驳得好：

夫昆仑为地轴，其山根连延起顿，包河南，接秦陇，直达长安，为南山。黑水自燉煌而南，纵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水经注释》卷四十）！

这个地形上的困难问题原不是在笔头上转几下所能解决的，所以伪孔、郦、孔三人的说话等于没有说。第二派是存而不论。郑玄说：

《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记此山水所在，今中国无也（《史记·夏本纪·集解·索隐》引）。

杜佑也说：

按郦道元注《水经》，锐意寻讨，亦不能知黑水所经之处。顾野王撰《舆地志》，以为至夔道入江，其言与《禹贡》不同，未为实录。至于孔、郑通儒莫知其所，或是年代久远，遂至埋没无以详焉（《通典》卷一七五《古梁州》条）。

这虽不是究竟办法，然而问题既经这般的无可奈何，也只得推出知识圈以外，置之不理，让古人自己去负责。第三派是比较科学性的，他们要把事实和经典对勘，既尊重经典，又不抹杀事实。这工作的结果是把一条水分成几条水，说它们在《禹贡》里是同名而异实的。胡渭《禹贡锥指》说：

黑水、三危并见雍州。梁之黑水别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

杜氏（杜佑）谓今已堙涸；自三危以南，则水行微外，不可得详，亦莫知其从何处入南海也。

照这样说，雍州的黑水和《导水》的黑水是一条水，这水的前一半已湮涸，后一半也不可考；梁州的黑水另是一条水，依胡渭说即金沙江，古名泸水。又蒋廷锡的《尚书地理今释》则分黑水为三条：

（1）雍州黑水——出陕西甘肃塞外（按是时甘肃尚未从陕西分出，青海也包在里面，故如是说），南流至河州入积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

（2）梁州黑水——即今云南之金沙江。其源发于西番诺莫浑五巴什山分支之东，曰阿克达母必拉；南流至塔城关，入云南丽江府境，亦曰丽水。……又东逕叙州府南入岷（岷江）。

（3）《导川》黑水——即今云南澜沧江，其源发于西番诺莫浑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儒那山入云南界。……南流至阿瓦国入南海。（按澜沧江流至印度支那半岛为湄公河，入海。）

大通河做雍州的分界水，金沙江做梁州的分界水，澜沧江做入南海的川，这样一讲似乎也过得去。可是《导水章》里分明说“至于三危”而“入于南海”，三危必在雍州境里，试问澜沧江如何可和三危发生关系？所以他苦心分析的结果也终于不可通。

讨论到这样，我们是不是把这个问题放弃了呢？我说：不然，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而解决的关键则在彻查《禹贡》和《水经注》所说的出典。

《禹贡》作者无疑是一个极有成就的地理学家，他处处剔去了神话而遵循着事实；但一个人必不能免于时代和环境的蒙蔽，他的时

代正是《山海经》占有地理权威的宝座的时代，他鼓起勇气，树立了反抗的旗帜，首先把昆仑山流出六条大水的说法打破，他不信有所谓赤水和青水，他把漾水归到嶓冢，河水归到积石。这实在是了不起的革命。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竟信了黑水！我们看，《海内西经》说：

黑水出（昆仑）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

《海内经》说：

南海之南，黑水青水之间，……若水出焉。

这是不是他写黑水“入于南海”的由来？《大荒北经》说：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

苗民即三苗，在传说里是迁于三危的，而在黑水之北，这是不是他写“至于三危”的由来？既已北至三危，南至南海这条黑水当然是纵贯中国西境的大川了，所以他要取它作为雍、梁二州的界水。虽说他看到的《山海经》未必即是今本，但《山海图》及类似今本的记载他必然看到，他脱不了这影响。这原不是他偏重了书本和传说以致受了欺骗，而是这条荒漠中的黑水离开那时的“中国”太远了，他到不了，别的地理学者也到不了，他得不到这方面的实际知识。

至于酈道元所说，则出于《南次三经》，经文云：

又东五百里曰鸡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他把这条经文和《禹贡》的文字合并起来，再加上“张掖”、“燉煌”等字样，就成了“黑水出张掖鸡山，南流至燉煌，过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这一条。可是鸡山在张掖何处，《南山经》在《山海图》里占何部位，他全未考虑。照

我看来，张掖并没有鸡山，只因自杜林以来把三危放到敦煌，而《禹贡》言“至于三危”，可见黑水不发源于燉煌，而张掖在燉煌之东，弱水既可西流，黑水何独不能，因此他就断说发源于张掖了。至于《南山经》的部位是在南方，经文叙述自西而东，所以第一个招摇之山就是“临于西海之上”。《南次三经》里的水如泔水、丹水、汎水、佐水都南流入海，这在图里一定离南海很近。这里的黑水该是偏处西南的，说不定和益州滇池的黑水祠倒有些渊源，却无从见出和昆仑有关，所以鸡山也决不该放到北方的张掖。后人作《张掖记》，看到《水经》此条，以为黑水可和张掖发生关系，当然是第一等的材料了，就大书道：

黑水出县界鸡山，亦名玄圃。昔娥氏女简狄浴于玄丘之水，即黑水也（《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引）。

于是张掖就真有了鸡山和黑水！

第四是三危，《禹贡》说：

三危既宅，三苗不叙（《雍州章》）。

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水章》）。

三危究在何处，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在敦煌。《汉书·地理志》说：

敦煌郡敦煌县：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

《尚书正义》阐述之曰：

《左传》称“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是三危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为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传》云：“先王居棗机于四裔，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预云：“允姓之祖与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燉煌也”（卷六）。

杜林是东汉初年的古文经学家，他读了《左

传》，记得姜戎与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而经师们均未详瓜州之地，适因避乱到敦煌，见地生美瓜，所以他就大胆地说，这里是古瓜州。此说为班固所采用，录入《汉书》，后人又就奉为金科玉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既采进了，而又加上一句“允姓之祖与三苗俱放于三危”，见得敦煌即是三危山所在，于是敦煌又真有了三危。以后陈陈相因，大家都信从不疑。可是郑玄的注却说：

《河图》及《地记》书云：“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尚书正义》卷六引）。

《续汉书·郡国志》说：

陇西郡首阳县：有鸟鼠同穴山，渭水所出。

刘昭注道：

《地道记》曰：“有三危，三苗所处。”那么，《河图》、《地记》和《晋书地道记》以及郑玄和刘昭都相信三危山是在首阳的，就是现今甘肃渭源县。这和杜林、杜预之说差的太远了！

这两处一在祁连山之北，一在西倾山之东，那个对呢？酈道元也弄不清，所以《水经

注》附录的《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说：

〔经〕三危，山，在燉煌县南。〔注〕《山海经》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在鸟鼠山西，即《尚书》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也。

既言在敦煌南，又说在鸟鼠西，昏乱到这样，叫人怎么办？

以上这四个地方——积石、弱水、黑水、三危——都和考昆仑有关系，所以叙出一个大概。凡事牵涉到经学，问题就多，材料又繁，上面所写只是极粗略的一瞰而已。

总合这些材料和考证看来，《禹贡》作者提到“昆仑”只当它一个西戎国名看，它的地位和析支、渠搜相等，没有什么独特的高超；他提到河源，又只说一个积石，跳过了这神秘区域不谈。这在古人里是少有的勇气！至于弱水、黑水、三危也都是《山海经》里的地名，只因神话色彩淡薄，一般人的称说又盛，他就从宽采用了。采用的结果，除了弱水可能有现实性外，黑水便不免出了显著的漏洞，三危也使后来人无法实定。我们对于这些，应当原谅他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和那个条件之下作成的小小错误！

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

黄 盛 璋

一、解 题

《西天路竟》系斯坦因自敦煌劫去之写本,今藏伦敦博物馆,编号S. 0383,据翟理斯《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解题》云:《西天路竟》一本,写于苍白色纸上,字迹清楚,长宽为30×42厘米^①,斯坦因曾复制一部于《西域考古图记》图版中^②,仅有数行,难窥全貌。全文过去未刊布,1954年伦敦博物馆出售所藏敦煌卷全部显微胶卷,包括有此写本。这是记中国赴印度的路程,“西天”即指印度,“路竟”即“路境”,是指所经历路程境域之意,文末最末一行:“东京至西天路程”,“西天路竟”亦即西天路程。全文仅十九行,不到四百字,但所录皆为经历路程地名,从东京到南印度海边,虽较简略,仍不失为研究中印交通有价值的资料。中外至今尚未见有专文研究,翟理斯所写目录解题,极为简略,寥寥两行中所订年代与地名均有错误,国内过去仅向达先生《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中有《西天路竟》,仅有目录,内容未作介绍。冯承钧先生在其论著中曾两次提到《西天路竟》,但他也未见全文,仅从斯坦因书获知此书而已,他在《大食人米撒儿行纪中之西域部落》一文中说:“斯坦因在敦煌得的一部写本名称《西天路竟》,若将其中的部落名称

与此纪行对照,必定可以校正若干讹误”,^③其实《西天路竟》中并无部落名称,也不能校米撒儿行纪中之部落,冯先生仅据斯坦因书中复照的片段文字而加以推测,判断失误,诚难以避免。在伦敦出售敦煌卷子胶卷前,国内仅北京图书馆所藏王重民先生自伦敦摄回之胶卷,但也无此写本照片,故一般皆未能见原文。犹记二十多年前冯家昇先生即以此写本见询,他也未见全文,当时我曾录有副本,并就记诵所及,略加笺释,冯先生很希望我在全文笺证基础之上,写出研究论文,供学术界参考利用,事隔二十年,旧植已荒,今除将《笺证》另行充实改写外,特就其中若干关键问题加以考证,提纲挈领,总结而为此文。未必有当,多望各方指正。

二、年代、作者和写本来源

《西天路竟》首尾完整,没有记作者或抄写者和抄写时间,写本来源亦无说明,因而对于写本时代意见颇有不同,上引翟理斯《目录解题》所订年代为:“约为公元900年”,900年

① 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p. 234.

② Aurel Stein: «Serindia» pl. clxvll.

③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纂汇辑》第187页。